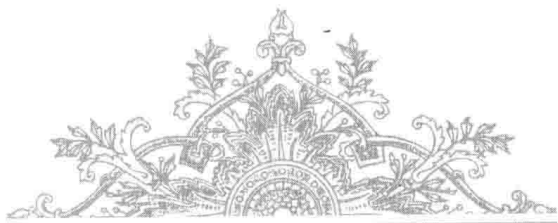


Wendy Swartz 著 张月译

阅读陶渊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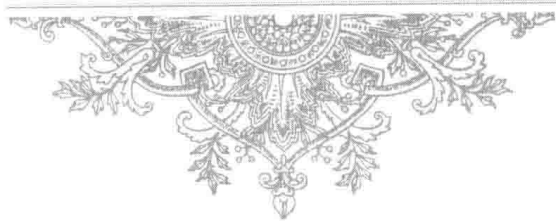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Wendy Swartz 著 张月译

阅读陶渊明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陶渊明/Wendy Swartz 著;张月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16.11

书名原文: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

ISBN 978-7-101-12021-9

I. 阅… II. ①W…②张… III. 陶渊明(365-427)-诗歌研究 IV. I207.227.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619号

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 by Wendy Swartz,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8. Copyright © 2008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 书 名 阅读陶渊明
著 者 Wendy Swartz
译 者 张 月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8 $\frac{3}{4}$ 插页2 字数35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021-9
定 价 68.00元
-

序

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陶渊明,一名陶潜,现在被公认为第一流的中国诗人。恩师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在氏著《陶潜的诗歌》(*The Poetry of T'ao Ch'ien*)引言部分便开宗明义:“即便在最简明最严选的中国著名诗人名单上也得有陶潜,他是中国文学领域一位实至名归的大家。按年代,他上继至今仍面目模糊的公元前3世纪爱国诗人屈原,下启8世纪名家李白和杜甫。”尽管陶渊明在中国文学经典里拥有无可置疑的地位,这个地位却不是一直以来就如此巩固的。在他身后数个世纪里,陶渊明作为隐士——而不是因其诗名——广为人知。尽管在李唐时代他的诗歌开始逐渐引人注目,但是只有到宋代他的作品才开始被奉为诗歌经典。田菱这部精彩纷呈的著作主要就是探讨陶渊明诗歌和文化双重偶像地位的确立过程。捉笔作序,与有荣焉。

田菱长在台湾,自幼习得中英双文。她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读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进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现任美国学术联合会主席的余宝琳(Pauline Yu)取得比较文学和中文博士学位。田菱是著即发轫于她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田菱教授是著主要着眼于陶渊明“身后声名”(posthumous reputation)的“建构”(construction)和在其作品的接受过程中所涉及的“机制”(mechanisms)问题。她的研究植根于西方接受史理论,全面探讨了从甫问世直到晚清,陶渊明作品是怎样被解读和评价的。在第一、二章,田菱集中讨论了从萧齐到初唐,人们怎样在不同的传记中塑造形象各异的陶渊明。她将这些传记和陶渊明友人颜延之(384—456)的诔文进行比较,进而探究从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中能够剥离出的传记信息。田菱教授对上述材料没有采取单一向度的研究方式,而是令人惊叹地在这些材料中识别出陶渊明的一系列不同面相,并分门别类为:“精神隐士”、“反常隐士”、“绝尘隐士”和“精神英雄”。对于这种鞭辟入里的多维研究方法我深所服膺。

关于陶渊明最早的传记出自梁太子萧统(501—531)之手,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收录了很多陶渊明的作品。萧统还亲自收集陶渊明的作品并冠以序,这篇序至今留存。萧统毫不掩饰自己对陶渊明的崇拜,在他那个时代陶渊明诗名未著。职此之故,陶渊明在与萧统居于同一时代的钟嵘(约469—518)那里只得到“中品”。萧统为陶渊明作序:“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如此热情洋溢的对其作家价值的首肯,即便在陶渊明声名更其巩固的后来也并不多见。

是著一个为其书名所不能彰显的优点是其跨度之广。田菱教授的研究由六朝晚期直至清季,甚至还涵盖了一些民初史料。然而,与一些文学研究者不同,田菱始终审慎地将陶渊明的具体研究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譬如,在探讨朱明时代对陶渊明的

评价时,她指出胡应麟(1551—1602)、杨慎(1488—1559)等人对于陶渊明的评价应该被置于文学复古运动理论的背景之下来理解。同理,在研究清代考证学者对陶渊明的考释这一节,田菱不厌其详又充满睿智地借鉴了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清朝“考证学”(evidential research)的研究成果。

尽管田菱教授的研究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她却并不搬用令读者消受不了的炫目理论和技术术语。她文理清晰,令人信服,引人入胜。鉴于其研究时间跨度之大,她本可能很轻易地误入歧途,即对所引用的广泛材料进行过于简单的分析。田菱虽非训诂学出身,但她对于尼采认为训诂学的观念(notion of philology)即在于“慢读的艺术”(the art of reading slowly)似乎深谙三昧。她对文本,尤其是诗歌,展开敏锐的细读。是著包含了对李白、白居易、王维、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陆游等诗歌大家作品的精心英译,同时也收录了一些西方学者尚未措意而声名稍逊的诗人作品的英译,比如南唐诗人李中。这些诗歌英译倘若抽取出来便可以组成选集另行结集出版。

欣闻田菱是著译成中文,读者更众。我深信是著将为中国学人所欢迎。谨此祝贺担当这部出色之作付梓重任的中华书局。

目 次

序	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隐逸		24
早期史传中的陶渊明隐士形象		28
唐代对陶渊明隐逸的暗喻及其矛盾		47
宋代对陶渊明隐逸哲思及动机的探索		75
第三章 人格		97
早期诠释学理论中的人格解读		98
道德高尚还是超凡脱俗的隐士		109
从超脱的隐士到道德的楷模		118
插 曲 陶渊明的自传项目		133
第四章 从六朝到宋代的文学接受		149
六朝时期对陶渊明的几种早期观点		150
唐代诗歌对陶渊明的运用		165
宋代对陶渊明的重新定义和经典化		193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文学接受	220
文学史中(外)的陶渊明	221
进一步细读陶渊明	237
陶渊明研究中的考证研究	254
结 论	267
主要参考文献	273

第一章 引言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辛弃疾(1140—1207)

本书将从陶渊明的逝世开始，随着时间推移，陶渊明（或称陶潜，365?—427）逐渐被推举认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①。千百年来，对他生活的描绘，无论是集中在他的任真自得、颖脱不群与嗜酒如命，或是聚焦于他典范的道德情操，都将他提升到偶像地位。近来对于经典形塑的研究暗示了一个普遍现象：作家可能在逝世好几世代后，他才取得如我们所知的声名；且此种“接受”（reception）上的改变，往往与他的作品本身关系较为疏离，而更加取决于不同时代的文籍编撰者及批评家的动机与需要^②。陶渊明的

① 陶渊明的名与字尚有争议。四种最早有关陶渊明的传记对他名与字的记载都有些微差异。20世纪初学者朱自清在古典与现代早期的史料中发现十种有关陶渊明名与字的不同纪录。朱自清认为，陶渊明的名之所以未被清楚记录，肇因于他的家族正在没落且他的文学作品在当世并未获得重视。参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2:457—458。

② 关于中国经典形塑的进一步讨论，参 Pauline Yu，“Charting the Landscape of Chinese Poetry”及“Canon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接受”是个特别发人深思的例子。除非我们找出他历史形象建构过程中的转捩点及关键人物,否则作为一个在其身歿后数百年间不受重视的诗人,陶渊明的名气后来居上几乎像是个奇迹。本书即是对塑造典范诗人及文化偶像过程的一个考察。

任何关于“接受”(reception)的历史性研究都必须把解读习惯与批评方式的改变纳入考量。鉴于陶渊明接受史横跨的时间长度、文学语言相对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及文学别集的广泛流传,“接受”应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核心主题^①。在一系列共通文本、方法及研习目的中交流出的文化财富,其稳定的积累性与传播性,不但确认成员身份,同时保障了他们的优势。因为“接受”研究已然长久被认可足以揭示文学传统中诠释实践的流变过程,这使得对此课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中国,阅读实践的发展是一扇珍贵之窗,由此可观察出文人文化与价值的变化。对于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人物身后声名建构过程的研究、他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的运作机制以及陶渊明及其作品特定解读的经典化,能增进对传统中国文学与文化领域转变的理解。

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批评家们就将视野超拔于“作者”(author)或文本的语言作用之上来理解意义的产生;此项尝试的一个

^① 已有几篇短论或书中章节探讨或触及到中国古典诗人的接受或身后声名的问题。例如 Varsano, *Tracking the Banished Immortal*; Fisk, “On the Dialectics of the Strange and Sublime in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Tu Fu”; Chou, “Literary Reputations in Context”; Lee, “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Poetry of Wei Ying-wu” 及 Francis, “Standard of Excess”。关于陶渊明在传统诠释中的专论,可参 Chang, “The Unmasking of Tao Qian”;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 钟优民,《陶学发展史》、《陶学史话》;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页 292—398; 吴兆路,《陶渊明的文学地位是如何逐步确立的》; 林文月,《叩门拙言辞》; 曹旭,《〈诗品〉评陶诗发微》及高大鹏,《陶诗新论》,页 73—127。

焦点,即是正视读者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姚斯(Hans Robert Jauss)经常被视为将历史维度带入“接受”研究中的批评家。当文学史在西方名誉扫地之时,他试图将历史带回文学研究的中心,扩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界域。他提出所谓“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of work to work)应转变为“文本与人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between work and mankind)^①。“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建立的前提基于以下观点:“文学作品不是一个独立自存的物体,也不会对每个时代、每个读者都传达一样的意义……文学作品比较像是管弦乐编曲,带给不同时代的读者临场感,打动读者们的心弦。”(A literary work is not an object that stands by itself and that offers the same view to each reader in each period...It is much more like an orchestration that strikes ever new resonances among its readers...and brings it to a contemporary existence.)^②此观点的关键在于通过读者的积极参与来维持文学作品历史生命的方式,且将批评焦点从“创作与表现的传统美学”(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s of production and representation)转变成一种“接受与影响的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 and influence)^③。此种批评关注的转变起因于认知到“文学作品的品质与品第”(the quality and rank of

①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 15; 周宁,《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页 26。

②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 21. 姚斯理论提出的大背景是其期望恢复过往艺术品与现代关注的关联。在同一段落中,姚斯写道:文学作品如同管弦乐交奏般“将文本从语言的载体中解放”(frees the text from the material of the words)。然而文本是否真能从“语言的载体中解放”仍然高度存疑,尤其当我们把诗歌纳入其中加以考量。

③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 20.

a literary work)并非仅仅决定于“其原始的传记或历史处境”(the biographical or historical condition of its origin [Entstehung]);相反,它们源于“更难以捉摸的种种尺度,包括影响、接受与身后知名的程度”(from the criteria of influence, reception and posthumous fame, criteria that are more difficult to grasp)^①。在姚斯的模型中,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发生在他们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这种视野植基于特定传统中过往作品及读者自身的文化价值。当新的作品与新的历史处境改变了读者们的“预期”(expectations),他们的期待视野也跟着转变,对旧作的新评价与新诠释遂成为可能。审美与文化态度的概念不断流转,大大影响了对“文学作品的品质与品第”及作者声名之认知。理解此点是重要的,它帮助我们了解陶渊明的现代读者曾被哪些历史观念所影响。但是在传统中国,“(作品)原始的传记或历史处境”与“读者接受”从来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文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独特的这一问题需要被重建而不应被视为既定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学接受研究必须把文学问题放置于非文学范畴(例如历史、传记与道德)中加以考察。

虽然姚斯对理解作品历史接受过程的关注最终导向更贴切地理解作品涵义的目标^②,此目标使得他须为先前的种种解读作仲裁

① Jauss, "Literary History as Challenge,"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p. 5.

② 在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一书的导论中, Paul de Man (pp. ix-x) 指出了诠释学与诗学的差异:诠释学是致力于导向“意义的理解”(determination of meaning)的过程,而诗学则包括“语言载体的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 of linguistic entities)。De Man 举出耳熟能详的例子为证:荷马(Homer)将阿基里斯(Achilles)视为一只狮子。将此导向“阿基里斯十分英勇”的结论,属于诠释学的范畴;而考虑“荷马究竟使用的是明喻(simile)还是隐喻(metaphor)",则是诗学的关注。De Man 因此将 Jauss 界定为诠释学家(hermeneut)。

且为自己在其中定位,但是本书并非如前此研究仅针对陶渊明本人及他的作品,而更着重在以下课题的探讨:“陶渊明”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隐隐脉动的运作机制。本书并不单纯地将诠释学问题当作既定事实来自动评判对陶渊明作品的论断。相反,本书把这些问题放回历史脉络中探讨,考察当初是在何种社会与学术条件下派生出这些言论;并试图去回答:为何某些特定的诠释探索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产生,而不是在更早的时空背景下发生。具体来说,本书使用的方法并非以时代较后的批评去追问作者意图,或最终在作者自身的作品中找寻有关其后接受史的答案^①。我关注读者与陶渊明作品进行的诠释性对话(interpretive negotiations),特别是某些超越陶渊明作品范围的因素:例如诠释实践、批评词汇与文化需求上的改变;同时也试图勾勒出那些兴致勃勃又举足轻重的读者群如何斡旋其中。我相信,此种研究方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释在历史长流之中涌现出的不同陶渊明形象及其作品的不同解读方式。那不仅仅是一系列迥异更迭的图绘,而且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深深被文人文化三大核心范畴交织出的对话所牵引着,且已经持续了一千五百年之久。这三大范畴分别是:隐逸(reclusion)、人格(personality)及诗歌(poetry)。

* * *

陶渊明逝世后并不仅仅(或许较少)被看作为一位僵化定型的

^① 此观点先前已有人触及。例如 Paula Varsano 最近有关唐代诗人李白及其后批评接受史的专著 *Tracking the Banished Immortal*, pp. 22、24、199。

“传说人物”，他像是一面珍贵的镜子反映出那些曾阅读他及与其相关事情的人们。事实上，我们目前可以确知历史上陶渊明的一些事情。他生于东晋(317—420)的浔阳柴桑(现今的江西九江)，当时的社会为世家大族所垄断。他来自一个缺少步入高层特权的职位较低的仕宦家庭，但是仍然可以夸耀其显赫的家族仕途传统。他的曾祖父是鼎鼎有名的大将军陶侃(259—334)，因其平定了公元327—329年的苏峻之乱而被封为长沙郡公，稳固了早年的东晋政局。他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他的外祖父孟嘉(约生活于4世纪中)任职参军，为当时中国南方最有势力的桓温(312—373)效力。但在陶渊明出生之时，他的家族已然没落。这些功成名就的先祖后来仅仅成为陶渊明心中追怀的理想典范。关于他的生年仍有争议，但大部分学者倾向接受公元365年这一说法^①。

相较于同时代人而言，陶渊明较晚出仕又甚早归隐。他曾经担任过一系列卑微的官职直到公元405年辞官解绶为止。其中较确定的是他侍奉过桓玄(369—404)与刘裕(363—422)，此两人都在日后意图篡晋自立，只是桓玄于403—404年失败，而刘裕则在420年成功建立新朝。这些政变都反映了晋朝最后数十年间司空见惯的动荡，而东晋也最终被刘裕建立的宋朝(420—479)所取代。

^① 无论传统或现代的大部分学者依循王质(1135—1189)的系年将陶渊明生年定在公元365年，此表示他活了六十三岁(西洋算法实岁为六十二)。某些学者则根据不同材料或相异解读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例如，张缜(1163年进士)与今人袁行霈将其生年系于公元352年(七十六岁)；古直系于376年(五十二岁)；梁启超则认为应系于372年(五十六岁)。参《陶渊明年谱》，页211—242。

陶渊明于405年归隐后,余生都在浔阳周边息隐躬耕。他同时体验着四体勤劳自给自足的快乐与农耕生活学稼五谷的艰辛。无论如何,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全然的“环堵萧然”与“息交绝游”。他嗜酒的癖好远近驰名,然而他虽然常常独饮,共饮同乐却也是他社交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无论低层官吏、其他文人雅士或邻家农翁都曾是他欢快陶然的酒伴。终其一生,陶渊明以“隐士”身份在乡野闻名。(此处的叙述并不具有反讽意味,因为在六朝[420—589]隐逸的形式事实上可同时与活跃的社交并存,我们在之后的章节还会再看到。)现今流传下来的陶渊明作品多半是他于此时期完成的^①。

陶渊明的现存作品包括不同体裁的诗一百二十余首、赋三首及韵、散文等十篇。遍览陶集的各种体裁,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行役差旅之际生发的咏叹、与友人应酬或唱和之诗、遥想古人之咏史诗,及将退隐期间种种沉思及事件付诸吟咏。最后一种性质的诗篇占了他作品的大多数。绝大多数的诗文的主题及引用点都围绕着隐逸而发。即使是他在任官之时写下的诗,也传达出一种对归隐的渴望。陶渊明描绘了田居生活之乐:饮酒、抚琴、熙然闲散、好读书及著文章以自娱;他同时也记录下了农耕的艰辛及贫困的试炼。例如,饥

^① 虽然陶渊明生平的轮廓大抵清晰且已被为数众多的传统或现代学者描绘过,但是因为系年与资料的散失,只有极少数细节不具争议。陶渊明简略传记的英文版,可参TYM, 1:5-10及Wing-Ming Chang, “Tao Ch'ien” in Nienhause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pp. 766-769。关于陶渊明生平公认的中文资料是其传统与现代传记的编年汇编,《陶渊明年谱》,许逸民校辑。并可同时参看李锦全《陶潜评传》及龚斌《陶渊明传论》,两书中讨论了陶渊明的家族、社会关系、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及文学风格等。

寒交迫的状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在以下数行诗句中,如实反映了他对时光快速流逝的盼望:“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①偶尔,他也会沉入对年少壮志的追叹及一事无成的伤感。尽管如此,他的诗篇出现了两种交错回旋的姿态:志愿决心的重申及守节的宣告。

一言以蔽之,陶渊明确书写着自己。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学史中,从未有人像他一样如此坦率地诉说着自己的种种理念、恐惧、个人喜好及渴望;或是如此一丝不苟地记录下自己的写作年月及在作品前附加标明写作缘由的小序。陶集中强烈的自传性直接引申出两个问题:在后代的批评接受中,陶渊明本人握有多少主导权,他的自我认定起了多少作用?而他巨细靡遗的自我描绘,又在何种程度上界定与约束了日后对他及其作品的诠释?陶渊明的自传性写作与他的接受史相关,但并非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成为本书插入章节的主题。我的讨论提倡两种观念的对立:一端系于陶渊明自传写作呈显出的创作与表现概念;另一端则并不纯然符合陶渊明当初的精心设定,而深受读者的接受回响。几种研究陶渊明自传性作品的视角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对文学作品中自我形象的自觉建构,与其后读者认定他“无意为文”及“谓之实录”的态度,正好相映成趣。当然这还应包括他循环往复的精彩自我矛盾:一方面,他告诉我们,他的书写是为让后世知道“陶渊明”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厌其烦地陈述自己其实并不在乎后世声名(也就是后人如何解读其为人与作品)。陶渊明自传写作的核心也许正

^① 《陶渊明集校笺》,页98。所有引用的陶渊明诗歌均来自此书,如有不同出处,将具体标明。

位于一本正经与嬉戏趣味的模糊交界；后者意味着对自传书写界限的认知，却又同时具有扩张推进的企图。

* * *

陶渊明作品中鲜明的自传特质确实使得后代在讨论他的作品时特别关注他的人格；尤其在传统中国，作家的“人格”及生活史总是被整合入他的作品解读中。在西方与中国传统中，传记对于作家作品的诠释影响有着迥然的差异。俄国形式主义学者 Boris Tomaševskij 曾指出：西方在 18 世纪以前曾有几个时期，读者对作家的人格特质毫无兴趣。一直到“创造的个性化——在艺术过程中孕育主观论的新纪元——作者的名字与人格才浮上台面”。（individualization of creativity—an epoch which cultivated subjectivism in the artistic process—[that] the nam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author came to the forefront.）^①对中国读者而言，一切刚好相反：在传统中，一位诗人的传记总被引用构成对其诠释的关键要素。《尚书》中的悠远格言“诗言志”^②，及《孟子》的名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些至理名言反映出传统的阅读习惯，同时也引出了两个重要的并行假设：一、诗作为一种自我表白的特殊形式，直接吐露了作者的真实心志且使读者得以感知它；二、优秀的读者应将眼光流连于文本背后的作者身影。屈原（约公元前 343 年—约公元前 277 年）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对其诗的诠释总与他遭

① Tomaševskij, “Literature and Biography,” p. 48.

② 参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 40.